

·高等教育史·

我国大学校训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走势

李 翠^①

(南京理工大学 党委宣传部, 江苏 南京 210094)

摘要: 大学校训作为大学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其演进历程反映了不同时期大学教育理念与大学文化的价值追求。在中国大学校训百余年的发展演变中, 早期是“百花齐放”; 解放后, 大学校训经历了批判、动乱与迷失自我阶段, 自我意识苏醒阶段, 文化自觉阶段; 进入21世纪, 大学校训文化再次繁荣, 但同时显示出新的教育理念的缺失。

关键词: 大学校训; 历史演变; 发展走势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05)01-0082-05

The historical progressing course and developing tendency of China'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mottoes

LI Hui

(Department of Propaganda,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Abstract: For the motto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the cultural system of the university, its progression reflects the educational idea and the value what a university pursues during a certain time. There has once been a time of free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forms and styles during the over-hundred-year developing and evolving of the school mottoes. And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China, those mottoes have experienced three periods, that is the period of being criticized, disturbed and self-losing, the reviving of self-awareness, being conscious of their own culture. Entering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school motto shows absence of new educational idea though spontaneously it once again flourishes.

Key words: China'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mottoes; historical progressing course; developing tendency

校训是一所学校教育理念、治学风格的高度概括, 是学校办学传统与育人目标的集中体现, 同时也是大学文化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内容。因而, 研究大学校训是研究大学的办学传统、教育理念与大

学文化的重要内容。最近几年来, 研究大学校训的文章增多。但是, 相对于越来越深入广泛的大学理念、大学文化研究而言, 关于大学校训历史的阐述与研究却不多见。笔者尝试从掌握的资料里寻找一些

^① 收稿日期: 2004-11-01

作者简介: 李 翠(1968—), 男, 湖南临湘人, 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校报编辑室主任, 编辑, 从事新闻实务教学与研究、大学文化研究。

线索,以期梳理出中国大学校训的历史脉络。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诚如蔡元培先生所言:“乃直取欧洲大学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之太学演化而成也”。本文所讨论的大学也即是以此为界定。

一、中国最早的大学校训 及民国时期校训的“百花齐放”

正像究竟谁是中国的第一所大学仍存争议一样,中国的第一条大学校训也是有待进一步考证的。但可以肯定是外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笔者以为,很可能是圣约翰大学。

1879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设立圣约翰书院。1892年,院长卜舛济筹款在圣约翰书院添设大学部,三年后有了三名首届大学毕业生。但是直到1905年,圣约翰书院才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条例正式组建为圣约翰大学。^[1]在更名的同时,也明确“Light and Truth”(“光与真理”)为该校校训。可是,“光与真理”在圣约翰书院时期即为校训,这一校训确立的时间,是应当以开设大学部的1892年算,还是从正式更名的1905年算,有待商榷。

如果圣约翰大学的校训不能算最早的话,那么,最早提出校训的就应该是1901年3月由美国监理公会正式创办的东吴大学。这所通过学习圣约翰大学的办学经验而创立的大学,在创办之时即提出了英文校训:“Unto a Full Grown Man”(“为社会造就完美的人格”)。

至于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较早确立校训的有下述几所。南京大学的前身,1902年由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在1906年更名为两江师范优级学堂时,主持学校的李瑞清就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作为校训。不过,根据当时实行的“癸卯学制”,这所学堂还算不上是大学。只是到了1914年,两江师范优级学堂改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才勉强称得上大学。这时江谦出任校长,明确校训为“诚”。^[2]1914年,名副其实的大学——北洋大学由赵天麟出任校长,提出“实事求是”的校训。同年冬,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以《君子》为题作演讲,此后“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成为校训。何时确认没有记载,但在1917年清华大学修建大礼堂时,将此八字嵌入校徽高悬大礼堂正额,可以证明确认时间最迟就在这一年。1917年11月,位于武昌的私立中华大学由创办人陈宣恺的儿子陈时继任校长之后,为学校制定了校训“成德、达材、独立、进取”。

以上这些应该算是中国大学最早的一批校训。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制定校训的大学涵盖了教会大学、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等各种类型。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教育家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公布了“壬子学制”,又陆续颁布了《大学令》、《专门学校令》、《师范教育令》、《大学教育规程》等一系列法令。^[3]中国大学遂开始实现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的转变,大学发展呈蓬勃之势,大学校训亦显繁荣。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学订立校训已经十分普遍了。比如,1921年燕京大学确定用“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作为校训。同年,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并亲自订立校训为“自强不息,止于至善”。1923年,北京交通大学明确了“知行”为校训。1924年,孙中山为自己倡议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现中山大学),题写了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1932年,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提出了“诚朴雄伟”的校训。1934年,在南开大学创办30周年的校庆纪念会上,创始人张伯苓校长正式宣布“公”和“能”为南开大学的校训。

1938年7月,当时的民国政府教育部指示全国高校制定自己的校训校歌,并呈报教育部以备核查。这又催生了一批新的校训。西南联合大学的校训即是此时诞生。据西南联大校歌曲作者张清常的回忆,西南联大为向教育部呈报校训校歌,学校常委会在1938年10月6日决议成立“校歌校训委员会”,委员是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以冯友兰先生为主席。11月24日,“校歌校训委员会”向学校常委会报告,拟校训为“刚健笃实”四字,经学校常委会讨论最终确立为“刚毅坚卓”。^[4]与此同时,西北联合大学因为同样的理由,确立了校训为“公诚勤朴”。1938年11月1日,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在广西宜山的开学典礼上,提出要以“求是”两字为校训,11月19日,校务会议正式通过了竺校长的这项提议。

此时,大学校训不单繁荣,而且各所大学的校训少有重复与雷同,各具特色,各有深意,可谓“百花齐放”。笔者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实践,成为早期中国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生态环境之一”^[5]。

至于中国的大学为什么会热衷于确立校训,恐怕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自然是因为我们所仿效的西方大学,大多有一个核心的办学理念,至于是不是与我们所指称的“校训”完全等同,则难以断言,但的确有相仿之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教育传统

的确是注重一个“训”的。家训姑且不说,传统书院的学规、训词,也颇具校训的意味。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方针下,以中国传统的“训”来体现核心的办学或者教育理念,应是顺理成章。还有,就是民国政府的要求。

可是,就在西南联大制定了自己的校训后没多久,民国政府教育部却来了个急转弯,1939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代电:各级学校校训,经中国国民党蒋总裁建议规定为“礼义廉耻”四字,兹颁发遵照悬挂。^[6]而且,对西南联大制定的校训校歌不予批准。此举虽遭到西南联大的抵制,但“礼义廉耻”一统学校的情形还是显现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急转弯,当是国民党从1926年开始推行的“党化教育”(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决定改称“三民主义教育”)膨胀发展的结果。

不过,另外一股清新的风气冲破了桎梏。在解放区,由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华北大学等提出了从内容到形式都完全不同“国统区”大学的教育理念,给这一时期的大学校训增添了异样的色彩。1937年成立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和1938年创立的鲁迅艺术学院,校训都由毛泽东提出,前者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后者为“紧张、严肃、刻苦、虚心”。1948年8月24日华北大学成立,订立的校训为“忠诚、团结、朴实、虚心”。

在当时的语境中,以如此通俗易懂的平实白话来作大学校训,实在称得上是“异类”了。不过,这为数不多的几所中国共产党大学的校训出现了雷同,显示出过于强调共性的取向。

二、解放后大学校训经历的三个阶段

解放后,大学校训的发展是在继承解放区的大学传统与批判国民党治下的大学校训中开始的。笔者认为,解放后的大学校训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批判、动乱与迷失自我阶段

这一阶段大略从解放时起,直到改革开放前。以一个典型事例来说明。前面提到的东吴大学,在本土化过程中,第一任华人校长杨永清于1929年春又订立了一个中文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但是解放后,先是1951级学生将校门上的英文校训抹掉,刻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字样。到1952年8月,在东吴大学旧址成立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前身)时,又将校门上的东吴大学校名与中文校训用水泥封掉。直至1998年,苏州大学才

打开封泥,恢复旧貌作为文物保留。^[7]

很多高校的校训遭到了与东吴大学校训类似的命运,被当作“四旧”予以批判、破除。清华大学大礼堂的那个嵌有校训的校徽也被一个巨大的五星挡住。

1952年全国院校大调整,随后动乱不断,教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高校也基本成为阶级斗争的场所。全国高校大多在显著位置悬挂“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为指针,几乎没有什么新校训可言。

这一阶段可以举出的例外为数不多。一是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为自己的母校——湖南第一师范题写的校训:“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再就是1955年由周恩来倡议的外交学院创建时,将周恩来总理向我国外交人员提出的“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十六字方针”作为校训。

2. 自我意识苏醒阶段

这一阶段大致从1977年恢复高考,大学教育逐渐走上正轨开始。直到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高校提出校训才又盛行一时。但这一时期的校训,大多是“团结、勤奋、求实、创新”(广西师范大学20世纪80年代初确立),“勤奋、严谨、信实、创新”(山西大学1992年确立),“团结、勤奋、严谨、求实”(河南农业大学1993年确立)等口号。这就导致了十分严重的雷同现象。请看笔者对2003年上半年229所中国高校的校训用词所作的一个统计(见表1)。这里列举的是使用频率居前10位的词。

表1 对229所中国高校校训用词的统计

用词	创新	求实	团结	勤奋	博学	求是	严谨	笃行	厚德	进取
次数	83	69	49	45	38	25	23	21	17	10
比例	36%	30%	21%	20%	17%	11%	10%	9%	7%	4%

如果再把笔者收集的59所高校的校风算上,用词统计如表2所示(基数为288)。

表2 对中国高校校训、校风用词的统计

用词	创新	求实	团结	勤奋	严谨	博学	求是	笃行	进取	厚德
次数	118	101	80	79	43	40	29	21	19	16
比例	41%	35%	28%	27%	15%	14%	10%	7%	7%	6%

从表 1、表 2 这两组数据中可以看出,“创新”、“求实”、“团结”、“勤奋”、“严谨”、“进取”这 6 个词不仅在校训中的使用率十分高,而且在校风中的使用率更高。

这 229 所高校的校训一共使用了 689 个词或词组,以及 3 句话。其中只有 254 个词或词组在字面上没有完全重复,有 435 个词是重复使用过的,重复词的比例为 63%。最为明显的是,“创新”、“求实”、“团结”、“勤奋”这四个词的使用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甚至有 15 所高校的校训是完全相同的这四个词,而且其中 12 所连词序也完全相同。另有 4 所高校的校风也是这四个词。

出现这种严重雷同的现象既与计划体制下大一统的教育模式有深刻联系,也与计划体制下大一统的社会组织形式有深刻联系。因为,这样的校训与其说是一校之训,不如说是对那个时代的社会整体价值观念的响应。这样的口号,不惟高校在大力倡导,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军队、乡村,几乎所有的单位都在使用,惊人的雷同。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到哪个单位甚至部门,这样的口号都能看到。单凭这些口号,谁也分不清楚所到之处,是高校,还是乡村的大队部。

不过,能提出自己的校训或校风,即使有很大雷同,毕竟还是提出了自己的追求,多少还是反映出主体意识的觉醒。也就是说,开始有自我意识了,尽管当时的语境无法显示自身的个性。

3. 文化自觉阶段

这一阶段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的社会形态再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也开始逐步推进以高校自主办学为核心的改革,并产生了一大批民办高校。高校自主办学的积极性越来越高,高校与中国其他社会组织一样,不仅有了充分的主体意识,文化自觉也再次复苏了。1994 年 6 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颁布了经学校师生员工广泛讨论后通过的新校训“博学、诚信、求索、笃行”,不仅显示了高等教育的特性,也体现了自己学校的特色。1997 年,北京师范大学由启功先生倡议并题写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1998 年,云南大学引入“视觉识别系统”(VIS),响亮地推出了惊世骇俗的校训——“立一等品格、求一等学识、成一等事业”,以及包括校风、云大精神、办学宗旨、教学理念等在内的一整套精神文化识别体系。这可以称得上是中国高校在大学文化建设历程中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性事件。由此开始,大学校训内涵

与形式的独特性成为高校明确自身文化形象的首要元素。

三、21 世纪大学校训 显示的新走向与新问题

有了文化自觉,重新审视并确立新校训就成了一个新的趋势。进入 21 世纪,大学校训文化再次达到繁荣的状态。2001 年 5 月,极少题词的朱镕基为国家会计学院题写了校训:“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账”。2002 年,江苏至少有 10 所高校举办校庆,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都在此时推出了校训。2003 年,江泽民为国防科技大学题写了校训:“厚德博学,强军兴国”。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进入新世纪后,有 48 所高校明确了校训或者提出了新校训,同时至少有 51 所高校公开征集校训或新校训。笔者对这 48 所高校的校训用词进行了统计,如表 3 所示。

表 3 对 48 所中国高校校训用词的统计

用词	博学	厚德	明德	笃行	求是	创新	至善	求实	勤奋	团结
次数	19	12	12	11	8	5	3	1	0	0
比例	40%	25%	25%	23%	17%	10%	6%	2%	0	0

表 3 中列出的用词除前 7 位是高频率使用的词外,“求实”、“勤奋”和“团结”是作为对比词列出的。可以看出,“博学”、“厚德”成为新的流行语,两个词除单独出现外,还有 5 所高校连用“厚德博学”,1 所高校连用“博学厚德”。“创新”、“求实”、“团结”和“勤奋”这四个词的使用率明显降低,“团结”和“勤奋”甚至没有高校在校训里使用了。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有不少高校提出的新校训取代的正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口号式校训。这一点可以从华中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等校训的变迁中得到证实。这几所大学原来的校训都是如前所提的“四词八字”口号,但现在都采用了新的校训。华中科技大学的新校训是“明德厚学、求是创新”,中国政法大学是“厚德、明法、格物、致公”,北京中医药大学是“勤求博采、厚德济生”。

这 48 所高校的校训一共用词或词组 143 个,有 83 个词没有重复使用,重复使用过的词为 60 个,占 42%,比起前述 229 所高校的校训重复使用词占

63%的比例来说,已经有了相当的改进。但是新的重复与雷同似乎又有呈现,“厚德”、“博学”、“笃行”、“至善”成为新的圭臬。

笔者以为,这同样与当前的思想潮流和共同价值追求有深刻联系。在任何时代,任何个性化的追求都会表达出那个时代的共性思潮,完全没有重复与雷同是不可能的。关键是,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有没有意识到在共性中的个性,有没有刻意去保存与继承富有自身特色的传统,有没有刻意去追求个性并把这种特色与个性凸现出来。

真正值得担忧的,是这些校训表达形式的复古热潮与新的个性化价值观和教育理念的匮乏。

笔者将大学校训的来源方式分出大致的三种类型:引经据典型、现代语词型和混合型。引经据典型指的是从中国古典著作中引用或引申的词语,比如清华大学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东南大学的“止于至善”等。现代语词型,如北京理工大学的“团结、勤奋、求实、创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等。混合型指的是既有古典语词,又有现代语词,如国防科技大学的“厚德博学、强军兴国”,广州大学的“博学笃行、与时俱进”等。

前述 229 所高校的校训中,三种类型分别是 59、114 和 56,各占总数的 26%、50%和 24%。而 21 世纪的新校训大都引经据典,采用了古语或者古语意味浓厚的语词,一共 121 个,占到总用词的 85%。复古情结明显,似乎不复古不足以摆脱口号式校训的影响。这实在有矫枉过正之嫌。

引经据典并采用古语词汇,一方面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以及传统价值观与教育理念的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也凸现中国高校现代意识与面向未来的教育理想的缺失。尽管大多数高校在

引经据典并使用古语时,不单纯是引述传统教育理念,而是赋予了新的涵义,给予了新的阐释,但根植于古语难免会有所拘泥,尤其是不大可能提出既富有现代感,又对未来具有启示意义的划时代的新教育理念。

前文提到有 3 所高校采用的是一句话作为校训,其中两所的校训分别是毛泽东为中国医科大学所题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以及为湖南第一师范题写的“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另一所的校训是西安科技大学的“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这 3 句话,包括朱镕基为国家会计学院题写的校训中的“不做假帐”,都是个性鲜明而又富有时代意义的好训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训词所倡导的,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不仅有现实意义,更对丰富教育思想,创造新的教育模式,造就富有个性化与创造力的未来一代具有深远影响。因此,纵观大学校训的历史与现状,笔者认为,它所缺少的已不再是自主意识与文化自觉,而是新的教育理念。

参考文献:

- [1][3] 金以林. 近代中国大学研究[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 [2] 沈卫威. 百年南京大学的的精神守望[EB/OL]. <http://www.nu.edu.cn>.
- [4] 张清常. 忆联大的音乐活动——兼忆西南联大校歌的创作[EB/OL]. <http://www.nankai.edu.cn>.
- [5] 杨东平. 大学精神[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3.
- [6] 中国教育百年大事[EB/OL]. <http://www.edu.cn/20010903/3000035.shtml>.
- [7] 杨铭, 吴竞. 东吴大学校训的由来及其演变[J]. 苏州杂志, 2003, (3).

(本文责任编辑 宋皎昱)